

# 台灣升學主義學校教育的結構原因

## —馬克思主義教育社會學觀點

林柏儀\*

### 摘要

台灣升學主義學校教育的結構原因，究竟是什麼？為何九零年代教育改革後，升學壓力仍揮之不去？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本篇論文分析了台灣社會對升學主義問題的「升學主義說」與「升學機會說」兩種論述，並透過馬克思主義將「升學競爭壓力」現象「還原」，指出升學主義的結構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下的(1)僱傭競爭壓力、(2)階層競爭需求，與(3)教育資源分配的菁英化。

基於這樣的分析觀點，本篇論文認為，倘若相關改革無法達成(1)去除資本需求與其對勞動力的影響、(2)促進平等化的階層結構，與(3)教育資源分配的平等化此三項目標，則僅透過「廣設（公立）高中大學」、「取消人力規劃與強制分流教育」等方法，或價值上認同「讓孩子從小競爭過於殘酷」而主張延後競爭，是不足以消解升學壓力的。反而恐將延後、強化、轉移競爭壓力，而未解決結構原因、甚至可能將正當化競爭帶來地壓迫。

本論文指出台灣教育中的七項特殊壓迫來源，包括了：(1)階層化教育結構的「菁英化」與「私校化」；(2)私人教育資本的強大影響力量；(3)高強度的政治控制教育運作；(4)高文憑者多數可進入公部門；(5)學校的單向度升學競爭文化；(6)教育與文憑勝過職業和收入的「特殊地位」；(7)不必要的競爭結構繼續運行...等。並指出七項特殊壓迫與資本主義邏輯具有一定的親和性，強化了升學競爭壓力，也一定程度地鞏固了資本主義邏輯。

關鍵字：馬克思主義、升學主義、升學競爭壓力、僱傭勞動前競爭、階層競爭

---

\* 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 台灣升學主義學校教育的結構原因

## 一馬克思主義教育社會學觀點<sup>1</sup>

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 第一節 台灣的升學主義現象

長久以來，台灣的學校教育受各方詬病。自解嚴以後，隨著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教育」也常成爲了被各界批判的對象；體罰、惡補、填鴨式教育、惡性升學競爭、學生壓力過大...等現象，層出不窮；1993 年時，教育部對當時的台灣學校教育問題，做了一個基本的分析：

由於**升學主義**的影響，聯考制度造成國中教學偏重智育、學生課業負擔繁重、並連帶產生**能力分班、越區就讀、惡補、體罰**等不正常現象，嚴重影響國中學生身心發展，殊堪憂慮。仔細分析這些國中教育所面臨的問題，主要乃在於**升學競爭、聯考壓力**所引起，如果只從改進國中教育本身著手，勢必仍無法根本解決問題。（教育部，1993: 3；轉引自張郁雯、林文瑛，2003: 167，**重點**是我加的）

教育部的官方說法，明確地指出，台灣學校教育（特別是中學教育）充滿著諸多不正常現象，但這些問題並非由學校教育自行產生、也無法自內部處理，而是受到了「升學主義」的影響，導致升學競爭、聯考壓力，才使教育無法正常運行。隨即之後，爲了因應 1994 年四一零教育改造大遊行以來，民間積極要求教育改革的呼聲，官方邀集各界所組成了「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其出版的「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中，亦肯認了這樣的台灣教育問題現象：

受到社會傳統文化期望、長期**升學主義、及文憑主義**的影響，使學校、家庭、教師、以及學生，幾乎將其全部人力及物力資源導向考試，形成一種**應付考試的奇特學校文化**，忽略正常的教育目標與理想。（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a: 17，**重點**是我加的）

大體而言，官方與社會各界皆同意，台灣存有著「升學主義」、或「文憑主義」的影響，使學校教育偏向爲準備升學考試而運行，喪失了「正常化」的學校

---

<sup>1</sup> 本篇論文是以我的碩士論文《求學作爲勞動：一個學校教育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之第五章〈台灣升學主義學校教育的結構原因〉改寫而成，感謝指導教授顧忠華老師、以及另外兩位口試委員劉梅君和宋文里老師的諸多指導與寶貴建議。也感謝政大研究生學會的熱情邀稿，及硬是投入資源辦出了這樣的一個「另類」研討會，讓我有一個能與同學們較深入討論此問題的機會。

教育，也帶給學生極大的課業壓力。然而，什麼是「升學主義」？爲什麼會有「升學主義」？官方並沒有提出清楚的論述來說明，關心教育問題的人們之間，往往也有著不同的看法。

並且，我們發現到，這樣的現象在台灣似乎是**長存的**。過去台灣教育中學生爲了升學競爭，必須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在學校和在課餘準備升學考試，我們還歷歷在目。然而，儘管經過了九零年代台灣的教育改革，歷經了「多元入學」、「增加教育機會」、「提高升學率」...等教育變遷，但根據「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的資料分析顯示，台灣學生投入在學校、課業、以及補習的時間，始終非常地長。加總來看，學生平均每日投入此種「求學勞動」的時間，甚至比「法定工時」（每日 8.5 小時）平均每日皆高上 **2~6 小時**<sup>2</sup>。而我認爲，平均投入「求學勞動」時間的長短，正是「升學壓力」強弱一個相當合適的指標。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在 2001 年及 2003 年，分別針對國中與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階段的學生，對其學校教育和生活環境，做了一系列縝密的調查（張苙雲 2003; 2005）。從其調查結果進行基本的描述性統計分析，我們發現，2001~2003 年的國中、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學生，仍然有相當大的升學課業壓力。以下是三個基礎的現象描述：

### (1) 平均每日在校時間

參見表 1 和表 2。我們發現，台灣的國中和高中職五專階段學生，平均每日在校時間，儘管到了 2001~2003 年，仍並不短。國一和高一的階段，平均大約是 10 小時，但到了國三和高三的階段，幾乎已到了 11 小時，其中甚至有 23.8% 的國三生在校達 12 小時以上，10.4% 的國三生在校達 14 小時以上。

---

<sup>2</sup>當然，求學勞動（活動）與僱傭勞動的內涵不同，規範僱傭勞動的「法定工時」或許不適合直接用以評析求學勞動的壓力是否過度。然而，倘若假設在台灣特有的升學主義教育下，求學勞動過程與僱傭勞動過程的「勞動強度」相仿，那麼「法定工時」將是一個可用以判定求學勞動時間是否過長，是否已使學生的勞動力無法「再生產」的地步（如缺乏睡眠時間、缺乏讓身體健康發展可能）的適當判準。關於求學勞動概念的進一步討論，可參閱林柏儀（2007a; 2007b）。

表 1. 國中階段上課期間，平均一天待在學校的時間

	一年級	三年級
不滿8小時	6.1	3.2
8小時以上，不滿10小時	42.4	35.2
10小時以上，不滿12小時	37.1	37.0
12小時以上，不滿14小時	7.1	13.8
14小時（含）以上	6.5	10.4
不合理值	.3	.0
未填答	.4	.5
總和	100.0	100.0

資料來源：張荳雲（2003; 2005）

表 2. 高中職五專（前三年）階段，平均一天待在學校的時間

	一年級	三年級
不滿8小時	5.5	5.7
8小時以上，不滿10小時	49.3	32.6
10小時以上，不滿12小時	28.4	18.1
12小時以上，不滿14小時	8.7	12.2
14小時（含）以上	7.9	8.4
不合理值	.1	.0
未填答	.1	22.9
總和	100.0	100.0

資料來源：張荳雲（2003; 2005）

## (2) 平均每週補習、家教時間

除了在校時間以外，更直接突顯台灣學生長時間投入升學課業準備的，就是其投入「校外補習和家教」的時間。根據台灣本土的狀況，在中學階段的校外補習，除了少數的藝文性活動以外，絕大多數都是和學校課業、特別是升學考試科目息息相關的。

觀察表3和表4，我們發現，台灣國一學生平均每週約有4個小時的補習時間；高一學生則略低於4小時；其中更有20%以上的國一學生，每週補習需達8小時以上。而國三和高三學生的補習時數稍微減少，「都沒有參加」的人數增加許多，皆達到4成以上；很有可能是因為國中和高中在三年級階段，為升學競爭準備而開辦（強制性）的課後輔導或晚間及假日自習所致，減少了學生能投入補習的時間。

表 3. 國中階段平均每星期參加校外補習或家教時間

	一年級	三年級
都沒有參加	27.9	43.7
不滿4小時	25.4	15.2
4小時以上，不滿8小時	24.9	18.8
8小時以上，不滿12小時	12.9	10.7
12小時（含）以上	8.4	10.8
不合理值	.2	.3
未填答	.4	.6
總和	100.0	100.0

資料來源：張苙雲（2003; 2005）

表 4. 高中職五專（前三年）階段平均每星期參加校外補習或家教的時間

	一年級	三年級
都沒有參加	27.4	42.1
4小時以下（不含4小時）	34.6	11.2
4~8小時（不含8小時）	30.0	10.7
8~12小時（不含12小時）	6.5	6.9
12小時以上（含）	1.0	6.1
不合理值	.2	.1
未填答	.2	22.9
總和	100	100.0

資料來源：張苙雲（2003; 2005）

### (3) 平均每日寫功課、唸書、準備考試的時間

再者，當問及其在「課外」、「補習以外」之餘，平均每日花多少時間投入「寫功課、唸書、準備考試」？表5及表6顯示，國一學生平均每日需投入2.5小時，而國三學生平均每日則約投入約2小時。高中職學生（扣除五專生，因其課程內容有異）則在高一時平均每日投入約1.5小時，高三時平均投入2.5小時。

表 5. 國中階段除去上課及補習家教外，每天平均寫功課、唸書、準備考試的時間

	一年級	三年級
不滿1小時	14.3	21.8
1小時以上，不滿2小時	30.0	24.1
2小時以上，不滿4小時	38.0	37.1
4小時以上，不滿6小時	12.4	12.2
6小時（含）以上	4.1	3.7
不合理值	.4	.5
未填答	.7	.6
總和	100.0	100.0

資料來源：張荳雲（2003; 2005）

表 6. 高中職階段，除去上課及補習家教外，每天平均寫功課、唸書、準備考試的時間

	一年級	三年級
1小時以下（不含1小時）	28.8	14.2
1~2小時（不含2小時）	15.5	20.3
2~4小時（不含4小時）	18.0	28.9
4~6小時（不含6小時）	8.8	11.0
6小時以上（含）	5.4	2.4
不合理值	.0	.2
未填答	23.5	22.9
總和	100.0	100.0

資料來源：張荳雲（2003; 2005）

總的來說，在2001~2003年的台灣中學階段學生，平均每日投入在「上學、補習、寫功課、唸書、準備考試」的時間，不論階段和年級，平均每日大約都在12個小時以上。從早上8點進入學校，約5~6點離開學校，又要投入平均至少2小時的「課餘求學時間」。

我認為這樣的數據的確顯示了台灣教育仍有相當大的課業壓力；特別觀察到始終存在的課外補習時間，可以理解到，這些課業壓力和升學競爭相當有關聯。所謂「升學競爭壓力」在台灣，恐怕仍有相當的強度。除此之外，我們發現到，台灣學生的平均受教育年數，也不斷增高。似乎這樣嚴重的升學主義教育問題，並無法隨「九零年代教改」的實施，簡單地被解消掉。究竟其原因何在，是既有的改革措施正確，但尚待時間變遷和資源投入來有效改變情況？還是有更多尚未被面對和處理的問題存在？總而言之，一直以來環繞台灣教育的「升學主義」問

題，始終是各界關心教育事務人士所思慮的焦點，也成為了本論文期待能夠進一步分析和解釋的對象。

## 第二節 升學壓力的結構原因一

### 對「升學主義說」與「升學機會說」的回應

前述提到，究竟什麼是「升學主義」？為什麼會有「升學主義」？官方並沒有提出清楚的論述來說明，而關心教育問題的人們之間，往往也有著不同的看法。

王震武與林文瑛（1994）曾經整理出四種對升學主義的代表性看法：「(1)徐南號（1993）認為升學主義是對教育抱持高度的信心和希望，因此是提升台灣教育水準的可貴動力，更是台灣教育的特色和優點。他說：『台灣兒童升學競爭的惡化』明顯是改革落後所造成，不宜嫁罪於升學主義。」；(2)楊國樞與葉啓政（1979）的觀點則是認為，所謂升學主義就是不顧個人的性向、才能，拼命為「升學」而升學的現象（楊國樞、葉啓政，1979）；(3)黃炳煌則指出：當個人不計一切健康上、人格發展上、經濟上的代價，但求生學，便是升學主義（黃炳煌，私人談話）；(4)學校一切活動的目的都該是在為升學做準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不惜違反法令規章和公認的教育原理。王震武與林文瑛認為這正是導致「教學不正常」，台灣特有的升學主義。」（以上轉引自張郁雯、林文瑛，2003: 168）

而黃春木（2004，:211）在面對「升學主義」問題時，則是觀察到，戰後台灣社會的教育需求或升學意願一直是在增強之中，而其受到「現代性」發展的影響，產生作用的因素至少包括了五個：

1. 文化傳統因素。
2. 現代化所形成的功績主義。
3. 家庭經濟條件的改善。
4. 高學歷所帶來的實質經濟與社會利益。
5. 升學機會的增加與考試的公平性。

總體來看，我們發現「升學主義」並非是個一貫的概念。儘管許多人都同意台灣有強烈的升學競爭現象，甚至認定這就是一種「升學主義」。但對於其造成的影響，及其原因，都有著不同的看法。甚至如黃春木（2004）的觀察，升學主義及實際的「教育需求」與「升學意願」，一直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受到諸多的因素所影響。以下，我們將針對對此各方不同的論述和解釋，提出分析，並應用前述章節發展出的理論，作批判性的回應。

#### 2.1. 升學競爭壓力的原因：升學主義或升學機會不足？

究竟台灣為什麼有強烈的升學競爭壓力？該如何改革才能減小升學競爭壓力？這個問題引發了關心教育改革各界的論爭、也牽涉到了不同的政策主張。張郁雯、林文瑛（2003）曾對「升學主義」此概念提出疑問，認為這樣的概念容易造成對「升學競爭壓力問題」一個常識性、但不正確的解答；其並將各界對「升學壓力」的歸因，分成歸因於「**升學主義**」與歸因於「**升學機會不足**」的兩大觀點：

其中，張郁雯、林文瑛（2003）指出，主張「**升學主義說**」的人士認為，升學壓力來自於人們關於升學「不理性的想法」，其內涵包括了：(1)不是為了獲得「合理的教育」而要求升學；(2)為了達成前述的升學目標，個人不惜付出沉重的代價；(3)為了幫助個人達成前述的升學目標，社會與學校也付出了可觀的代價，整個教育體系甚至因此失去了常規；(4)當這些升學目標達成了，個人與社會卻未蒙其利，反受其害：它敗壞了人才，也敗壞了風氣。升學主義說的觀點認為，是許多人「不適合」升學的人，因為「升學主義作祟」，不計代價地參與升學競爭以至於造成了不正常的教育現象，而並非是來自於「升學機會不足」。所以，在政策上，重要的是發展出更好的分類技術，改善招生制度，對於不同類的人，給予不同的教育（張郁雯、林文瑛，2003: 168）。

而主張「**升學機會說**」的人士則認為：升學壓力的來源是升學機會太少，不能滿足一般人的升學需求，以致升學市場供需失調，從而激化競爭，而非源自於升學主義（王震武、林文瑛，1994；林文瑛、王震武，1996；林全、吳聰敏，1994；張清溪，1994；張清溪、吳惠林，1996）；然而，升學機會為什麼會那麼小？主要是由於政府基於「人力規劃的考量」，有計畫地抑制高中、大學的容量，逼使多數人走向技職教育系統，好成為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林忠正，1994；張清溪，1994）。才造成多數人爭取少數機會的競爭現象，從而才有所謂的升學壓力；換句話說，錯誤的分流教育政策導致嚴重的升學壓力，不該怪罪於人民的意識形態。政策上關鍵不在於改善聯考之類的分類技術，而是要盡量提供充足的升學機會、滿足人民的教育需求，並且不應以人力規劃對人民強制提前分流（轉引自張郁雯、林文瑛，2003: 168）。

張郁雯、林文瑛（2003）對「升學主義說」與「升學機會說」的區分，將「升學主義」作為一種「文化觀念」，與「升學機會不足」這樣的「教育資源問題」兩者間巧妙地畫分了開來，而辯論究竟是哪一個原因，導致了台灣嚴重的升學競爭壓力。根據我的觀察，「升學機會說」可說是台灣九零年代教育改革中相當有影響力的一股力量。四二零教改聯盟提出的「廣設高中大學」，即是抱持這樣的觀點。聯盟的核心人物黃武雄（1996；2003）在其教改著作《台灣教育的重建》、及 2003 年繼續關注教改發展的長文〈教改怎麼辦〉中，即不斷指出**增加優質的升學機會**對改善教育的重要性，並批評不應將升學競爭視為是學生家長的觀念問題：

當大學畢業不再是菁英階級的標誌，各界用人唯才，這時候文憑主義便可以打破。…真正開放大學門戶，國民要讀大學與否，國家應盡量給予其自由選擇的機會。（黃武雄，1996: 7）

今日我們因教改流弊滋生而責怪家長學生觀念不對之前，必須承認多數大學品質浮濫的事實，而能設身處地，轉換角度去體會家長與學生的立場，尊重他們的理性選擇。…國中升高中的情況亦然。這八年來（從1994年民間教改運動起算）高中與高職學生人數已從3比7改善為5比5。但強制性的分流教育仍然扭曲學生與家長的意願，而許多品質不良的高中職更令人望而怯步。…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升學供需失衡**。在經濟市場上，我們皆認為調節供需是天經地義；但在教育市場中，我們卻認為供需失衡的關鍵，在於教育消費者的觀念不對。（黃武雄，2003，**重點**是我加的）

面對1994年四二零教育改造遊行所帶來的壓力，及其高呼的「廣設高中大學」訴求，隨後由官方邀集各界菁英組成、而掌管政策方向審議的「行政院教育審議委員會」，在其《第一期諮議報告書》中，先是對「擴大升學機會以解決升學競爭」持保留態度，而以「應顧及適才適所」回應民間壓力：

擴大招生名額並非就是最好或唯一解決升學競爭的方法。…（應）檢討各級學校的招生名額，看看是否適才的學生大體都有機會升學到適當的學校（或學系）。…招生名額的過度擴張，可能會招收不到適才的學生，同時也浪費了許多資源。（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a: 28）

但至《第二期諮議報告書》中，其則明顯改變態度，改為支持「擴大民間資源以增加升學機會」，並主張擴充能使高教之間競爭、而朝「多元化」發展。其指出：

我國高等教育的量必須擴充。其擴充應以運用民間資源，且以發展側重實務性教育之校院為主。政府不宜再挹注大量經費設置公立校院。就某種程度而言，公立校院的設置應該配合國家的規劃，尤其是一些辦學昂貴、民間無法支應、而相關人才又是國家所必需的系所。至於私立學校，則應將「市場機能」還給他們。…隨著高等教育量的擴充，在社會有充份的資訊以及學生得適性選擇的狀況下，學校間才有真正的競爭，而校院的功能，入學制度，以及學生來源等，均將朝「多元化」、與社會互動的方向發展。（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b: 54）

最後，在其《總諮議報告書》中也依循《第二期諮議報告書》的觀點，定調指出「高等教育容量應增加」：

高等教育的鬆綁，包括高等教育容量應繼續增加（研究型大學除外），高等教育學府的類型和功能宜多元化。合理分配教育資源，擴大民間資源投入，逐步放寬學費限制等。（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c: 摘7）

儘管教改會的論述中，對於「透過增加高等教育容量以減緩升學主義或升學壓力」，始終未持明顯肯定的態度。但在諸多因素匯聚下，「增加高教容量」的確成為九零年代以來教育變遷的政策方向，隨之「升學機會說」一時取得了台灣教改中相對主流的力量，九零年代以來各種（綜合）高中和大專院校紛紛林立，國中升高中與高中生大學的「升學率」也不斷攀升；「更多的高中和大專院校」和「多元入學」，似乎就是民眾認知中「教改」的代名詞，隱含著指出：念大學、唸高中的窄門已被打開，升學壓力導致的教育問題將隨之解決。然而，細心觀察可發現，教改審議委員會與後續官方所推動的「廣設高中大學」，其實際內涵已不同於四二零教改聯盟的主張。相較於四二零支持的「廣設公立高中大學」、「才可自由開放私人興學」<sup>3</sup>的立場，教改審議委員會和官方支持推動的則是「限縮公立學校擴張」，而直接以「私人資本擴大高等教育部門」<sup>4</sup>；並主張多興辦「實用型大學」，而非黃武雄提出的應興建的優質「研究型大學」或「基礎知識型大學」。官方的做法，也導致了九零年代以來更加強化的台灣「高等教育私有化、私校化」、與資源階層化的「公私雙元教育系統」<sup>5</sup>。

但升學競爭似乎沒能那麼容易解決，更何況官方「灌水」增加的劣質、私有化升學機會，實際上更加強化了「階層化高等教育結構」。我們在所謂「廣設高中大學」的「教改後」，仍然觀察到相當嚴重的升學競爭現象：為考試分數體罰、能力分班、強迫課後輔導...依然層出不窮<sup>6</sup>；並且，如本文第一節的觀察，也看到了直到 2001~2003 年，台灣的中等教育階段學生，仍須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在升學和課業上；甚至，升學壓力已延伸到了「研究所」階段的入學考試上。實際上，整體而言，「自民國八零年代起高中、大學校系逐年增多，但仍未顯著地減緩升

---

<sup>3</sup> 黃武雄在《台灣教育的重建》中即指出：「…完全開放人民興辦私校，另由政府直接承擔廣設大學，補足國民進大學的願望，而非把擴充進大學機會的責任推卸給民間。當進大學機會足夠充裕，學生選擇學校的市場機能，才可以發揮，也反過來可以刺激大學，尤其私校提昇教育品質」（黃武雄，1996: 47）；所以其「廣設高中大學」的觀點，實際上在台灣必須先「廣設公立高中大學」，保障人民的就學機會；另一方面才進一步開放私人自由興學，發展特色。

<sup>4</sup> 教育部九零年代以來大量浮濫地將專科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導致台灣大專院校「學校量與學生量」迅速攀升（因專科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後，其學校與學生數即被計入「大專院校」中），相關詳細的歷史與制度發展，可參閱林大森（2003）

<sup>5</sup> 在此「公私雙元教育系統」指的是：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之間，有著相當大的資源鴻溝，不但公立學校教育資源豐富，且其學費又比私校便宜，但數量卻相當少，甚至教師和學生在這兩個系統之間，相當難以流動。

<sup>6</sup> 台灣學校教育中的「考試分數體罰、能力分班、強迫課後輔導」，或許隨著時間演進有減少的趨勢（雖然仍持續存在），但不代表這是「升學機會增加」的結果。根據我的觀察，民間教改團體和政府近年來對此類問題較以往更為積極的介入，才是問題減少的關鍵原因。

學競爭的情形。國中、高中畢業生所享有的**就學機會率**<sup>7</sup>，已分別在七十五年、八十一年時開始突破 100%」（黃春木，2004:211）。黃春木（2004）透過對台灣戰後的升學壓力歷史分析總結到：「『擴充教育機會』在戰後台灣社會中常被用來當成解決升學主義的策略，但歷史證明其實際效果是不彰的。」，「可以增進教育效果或者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的方案，未必能緩和升學競爭，甚至還可能具有助成效果。」，現象與理論上觀察，為「升學機會說」的完整性和有效性，畫上了一個問號。

回到「升學主義說」與「升學機會說」的爭論，究竟台灣升學競爭劇烈的情況，是否可以透過提高「升學機會」來解決？還是如「升學主義說」有其「不理性的文化原因」？亦或此兩說皆不足以說明台灣的升學壓力，還有著更深一層的「結構原因」，或是其中有什麼樣的「制度問題」，影響著台灣的教育系統，使得升學競爭的壓力，始終都揮之不去！？

我相當支持，四二零教育改造聯盟（1996）在其出版品《民間教育改造藍圖—朝向社會正義的結構性變革》中，第二篇開頭引言的精神：「我們不缺教育改革者，而是真正的改革者！迴避結構性問題的枝節改革，終將失敗。」，的確，教育改革必須找出「結構性問題」，來從事「結構性變革」！但首先，不可迴避的關鍵仍是：「**什麼是台灣教育的結構性問題？**」，我們才能從而回答：「**該從事什麼樣的結構性變革？**」

在下一小節開始，我將透過「馬克思主義教育社會學」的相關觀點，指出「資本主義」發展對學校教育的諸多影響，將是探討台灣升學壓力上不可迴避的「結構原因」之一，甚至其具有相當大的解釋力，能將台灣教育的諸多制度特性涵蓋其中。

## 2.2. 以馬克思主義將升學壓力「還原」

馬克思主義關注探究問題的**本質**，而非其**表象**。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關注社會事實背後的結構與機制，而並非僅是事實與能被經驗到的現象。所以，秉持馬克思主義的「深度本體論」觀點<sup>8</sup>，當我們要討論台灣升學壓力的問題時，除了依循其現象與現象間的關係歸納原因外（如可觀察的升學機會與競爭壓力的關係），更要嘗試掌握其「非現象」性的結構限制與生成機制（如資本主

---

<sup>7</sup> 就學機會率指應屆畢業生能享有的下一個教育階段名額的機會，排除了非應屆畢業生（如重考生）計算入內。

<sup>8</sup> 「深度本體論」指的是認定社會事實包含了(1)被經驗到的「經驗層次」、(2)能被經驗但未被經驗的「實際層次」、以及(3)無法被經驗但實際存在的「真實層次」。相對於「扁平本體論」的社會研究僅觀察(1)與(2)的層次，持「深度本體論」馬克思主義觀點，更強調要納入對(3)的考察，特別就是社會中的「結構」與「生成機制」。可參考萬毓澤（2005）。

義發展規律對教育發展的影響)，才能完整的掌握研究對象與其（可能的）變遷規律，也才能提出有效的「解釋性批判」<sup>9</sup>（解釋升學競爭的原因為何，而提出應改變的對象），指出改革的方向為何。

所以，以馬克思主義來「還原」台灣升學壓力現象，我們將發現，此現象除了受其他現象的影響外，背後更有一連串複雜的結構限制與生成機制，而不只是「升學主義非理性文化」與「升學機會不足」兩類解釋能完全掌握。首先，教育問題無法自外於社會結構，我們必須將升學壓力置放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來思考：台灣的升學壓力與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究竟為何？我認為，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觀察，基於承受升學壓力的學生，將是未來的僱傭勞動者，且受其僱傭勞動時的可能處境高度影響了教育過程的選擇與行動（如是否要投入升學競爭）。此問題關鍵點可以先回到「僱傭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關係來考察：究竟資本主義社會的僱傭勞動者在什麼樣的處境當中？這樣的處境對升學壓力的影響是什麼？

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為了生存，幾乎日益無可避免地必須成為「僱傭勞動者」。僱傭勞動的機會來自於資本需求，勞動者必須能在僱傭勞動的過程中，創造出比自身拿到的工資來得更多的商品價值成為剩餘價值，才能取得僱傭勞動機會；除此之外，隨著資本主義的成熟發展，資本家對勞動者將有技術和知識上更進一步的要求，並且，勞動者間隨著「**人民的普勞化**」及「**勞動者的普遍化**」也將加強彼此之間的競爭。總結而言，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普遍性地導致勞動者必須投入更多的時間在「**僱傭勞動前的準備與競爭**」，特別表現在「**教育競爭**」中，才能符合資本需求與在「**勞勞相爭**」中勝出，而取得僱傭勞動機會。

同時，資本主義體系更發展出了勞動者的「**階層結構**」。除了資本家與廣大勞工的「**階級對立**」外，為了使僱傭勞動體系穩固、說服勞動者投入能力與生產效能的競賽、增加資本積累可能，僱傭勞動者內部亦產生「**階層化**」，不同的勞動者間具有職位層級、薪資多寡、地位高低、勞心或勞力、白領或藍領、勞動強度大小...等差異存在。並且資方將宣稱，在這之中「**向上升遷**」倚靠的是「**資質能力**」、「**努力程度**」、「**生產成果**」等「**功績**」（meritocracy）。於是，在「**階層結構**」利誘與「**僱傭機會**」威脅之下，更加「**打造**」出了勞動者的競爭需求，投入**僱傭勞動前**（教育程度、文憑、證照、良好工作態度...）與**僱傭勞動中**（加班時數、勞動強度、生產量、低工資）的競爭，創造了總體而言更高的剩餘價值生產。

這其中在「**僱傭勞動前**」的競爭，主要受到了「**國家機器**」的中介，而在「**學校教育**」制度中展開。其中主要包括了兩個層面：(1)**學校中的競爭機制**；以及(2)**階層化教育結構中的競爭機制**。前者指的是學校作為一個區分優/劣、好/壞、努

---

<sup>9</sup> 「解釋性批判」指的是「批判性的社會科學能夠熔解釋與批判於一爐，因為它藉由「揭露那些引發錯覺與苦難的機制」，來「幫助人們在實踐上努力用其他的結構來取代這些結構，以帶來好的生活」」（Danermark et al., 2002: 195；轉引自萬毓澤，2005: 18）

力/不努力…的場所，其中將有各種競爭機制，包括考試、評分、排名、賞罰…等，來將其中的學生**排序**；這套機制除了產生將學生**區分** (distinction) 的效果外，在競爭中失敗的學生，可能將被處罰、甚至退學。另一方面，後者所謂的「階層化教育結構」指的是一個教育系統中各層級教育的**數量結構與資源分佈**狀況，其中「資源」包括了國家補助的財務資本、體系排序中的象徵資本、反映其文憑價值的文化資本、與之中人際網絡價值的社會資本。關於「階層化教育結構」的競爭，即是能否取得相對高資源的教育機會與其文憑以證明自身，而該競爭機制則展現在升學考試競爭、升學考試資格取得、升學費用負擔能力…等之上。該競爭的強度受升學機會與升學需要影響—升學需要多過於升學機會越多，則競爭強度越強；但「是否需要朝更高的教育層級競爭」，則仰賴於該教育層級在階層化教育結構中的位置—倘若不夠高，則必須繼續向上競爭，才有實際價值<sup>10</sup>。在僱傭勞動前一學校教育制度中競爭成功的勞動者，取得了階層化教育結構中高層級的教育機會和文憑，以及在學校中競爭成功，使其能證明其具有優質的勞動力，而在僱傭徵選過程 (recruitment process)<sup>11</sup>和僱傭勞動中將能取得 (高階層的) 工作機會。

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之下，可以理解地，「竭力競爭能提高勞動力使用價值的教育機會，並且取得文憑證明自身品質」，成爲了**必要**的活動、也是**理性**的活動。勞動者這樣的僱傭機會競爭與階層競爭需求，會受到教育機會質量、階層化教育結構、以及國家調節的中介影響，而部份改變其教育需求與升學**競爭模式** (如影響提前在中學競爭或延後在高教競爭，以及各階段相對競爭強度的差異)，但不會改變其基於資本需求和階層結構而來的**僱傭勞動前競爭需求**。並且，在受限於國家與私人資源而幾乎必然的階層化教育結構，以及高教育能帶來相對優質的商品化勞動力使用價值情況下，勞動者的競爭需求幾乎就註定地將至少部分地表現在更高水準教育與文憑價值的競爭上，而產生了升學壓力。

如圖 1，用一個簡單的圖來說明從馬克思主義看升學壓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影響機制：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者，爲了符合資本主義和其階層結構產生的僱傭機會威脅與階層競爭利誘，在階層化教育結構的中介下，必須進行僱傭勞動前的競爭，而表現爲升學競爭和教育需求的升學壓力。

---

<sup>10</sup> Bourdieu (2002: 246) 曾提到：「根據結束學業年齡對收入進行的統計表明，從與進入高等教育的平均年齡大致對應的年齡開始，即到了下層階級幾乎完全被淘汰的學習階段，每多學習一年，經濟效益便隨之遽然增加。這一切都有助於提出這樣一種假設：隨著學習機會結構轉移，造成的進入一個給定階段學習的狀況不再罕見，這個年齡界線一直在不斷提高」。

<sup>11</sup> Rikowski (2000b) 曾經指出，儘管學校教育與勞動過程在制度上被二分，但僱傭徵選過程 (recruitment process) 是連結了此二者的關鍵階段：雇主將在其中評估個人的勞動力，包括徵選時實際的能力，以及其潛力——訓練與僱傭後的能力。是故，Rikowski 主張：要了解學校教育與勞動過程之間的內在關係，可對僱傭徵選過程做進一步的研究和分析。有關 Rikowski 對僱傭徵選階段的研究，可參考 (Rikowski, 1990, 1995; 1996b-d, 1999 and 2000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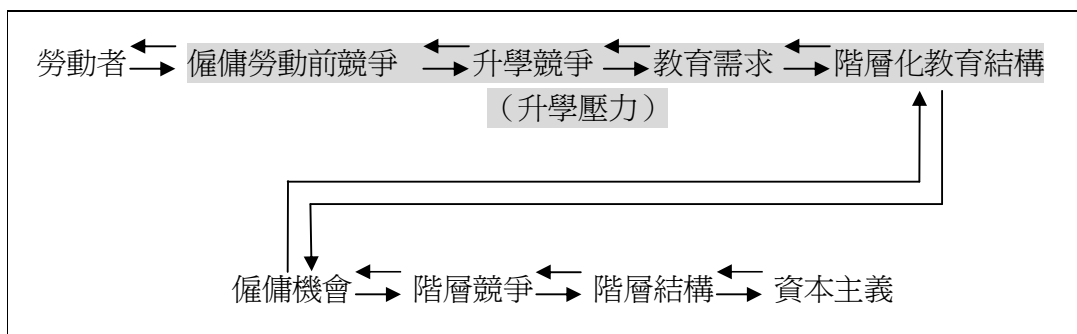


圖 1 升學壓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影響機制

依循這樣對升學壓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分析，基本上我們已可以說明，前述「升學主義說」觀點，過於簡化了問題，而無法掌握到升學壓力的「**政治經濟**」面向，且其對「文化」面向的論述也是極其**片面的**，只觀察到社會有一種「不理性」的升學動機，但無法說明，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形成了這種「不理性」的升學文化？且將此「社會條件」考量入內後，我們還能說此種升學動機是「不理性」的嗎？我同意張郁雯、林文瑛（2003）對「升學主義說」的批評，其僅是一種常識性、深具菁英主義意識形態，但是是錯誤的觀點。

於是，要回應對升學壓力的分析，我們關注的重點將放在「升學機會說」，以及由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和四一零教改聯盟代表之一黃武雄提出的三項核心論述上，分別是「廣設（公立）高中大學」、「延後分流」、以及「別讓孩子承受殘酷的競爭」。接下來我將運用前述馬克思主義教育社會學觀點，逐一對其進行討論與批判。

### 2.3. 對「廣設（公立）高中大學」的批評與回應

先將台灣官方實際浮濫灌水推動的「廣設高中大學」放在一邊。讓我們先以上一節馬克思主義對升學壓力的還原，來就理念上評估「升學機會說」中的第一個政策觀點：「廣設（公立）高中大學」對於解決升學壓力問題的有效性。綜合來說，我觀察到，資本主義社會中之所以產生升學競爭壓力，問題的原因在於：

- (1) **僱傭競爭**：資本主義透過控制僱傭機會，來要求勞動者競爭彼此的勞動力品質，競爭失敗者即無法取得僱傭機會、導致失業而無法生存。
- (2) **階層競爭**：資本主義發展出了勞動者中的階層化結構，於其中設立稀有高工資，鼓勵勞動者競爭其能力與生產成果，而用以獎賞優秀者，以穩定體系並增加剩餘價值產量。

(1)與(2)的競爭壓力和需求，除了表現在僱傭勞動中，也日漸延伸到了僱傭勞動前，特別是學校教育階段的競爭，導致了升學競爭壓力。以上兩者**提高了人民的教育需求**，而產生了追求進一步教育的升學競爭壓力。

- (3) **教育（財務與文化）資源分配的菁英化**：在國家與私人資源有限，以及資本主義往往只需要一小部份上層勞動者的情況下，由國家中介的階層化教育結構往往是菁英化的：教育機會（特別是高等教育機會）的稀有化，或是教育（財務與文化）資源的集中化，如明星大學、明星高中現象。由此所產生**不足的教育供給**，導致了另一層面的升學競爭壓力。

基於這樣的觀點，我認為升學競爭壓力與升學機會足夠與否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受到**更外部的「結構原因」**<sup>12</sup>所影響的。根據我們的分析：「升學競爭的強度受升學機會與升學需要影響—升學需要多過於升學機會越多，則競爭強度越強；但『是否需要朝更高的教育層級競爭』，則仰賴於該教育層級在階層化教育結構中的**位置**—倘若不夠高，則必須繼續向上競爭，才有實際價值。」，所以，「升學機會的提高」的確有可能使「升學機會」逼近於、甚或大過於「升學需求」，而減低了「對該階段升學競爭的壓力和強度」（例如實施十二年國教，將高中職階段改為無競爭性的免試入學，將能減小國中的升學壓力）。然而，在僱傭競爭與階層競爭的要求之下，勞動者仍然需要投入僱傭勞動前的競爭機制，必須以「高層級的教育訓練和文憑」將自己區分為優質的勞動力（如必須取得大學、研究所文憑或多張證照）。倘若該階段教育的「**數量擴張**」，使「升學機會」增加，其實同時也代表著該階段教育在階層化教育結構中「**層級下降**」，進一步導致了「需要朝更高的教育層級競爭」。整體考察觀之，透過提高某一階段向上的升學機會，升學競爭壓力在該階段可能會減小，但實際上，這樣也將導致了勞動者必須繼續「向上競爭」，才能取得僱傭勞動前足夠的「競爭力」——能排除他人以取得上層勞動機會的地位。於是，升學競爭壓力其實是被「延後」、「延長」了，整體的升學壓力並沒有減小、甚至可能因競爭時間的拉長而擴大。

但「廣設（公立）高中大學」的理念內涵，仍有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的地方。儘管按照我們的邏輯推演，「提高某階段的升學機會」對於「整體升學競爭壓力」的減小，存在著相當大的限制。但另外一方面，黃武雄等人的廣設（公立）高中

---

<sup>12</sup> 關於「結構原因」的層次，在此可以再舉一次黃武雄對台灣教育問題的結構性問題分析來說明。黃武雄曾在其與「里巷工作室」合拍的教改影片〈笑罷童年〉中，說到：「這是結構性的問題！台灣的學校教育，最大的兩個問題是：**升學主義和管理主義**。把這兩個東西拿掉了，台灣的教育才會正常。拿掉的方式是，把升學管道**大幅度的放寬**，又把學校目前強調集體管理的方式，改成**真正重視個體的教育**。這樣台灣的教育才可能真正改善。」（黃武雄，1996: 216-217，**重點**為原作者所加）。我們可以接受升學管道狹窄以及集體管理的教育方式，是升學主義和台灣教育問題的結構原因之一，但這樣的問題有其更上一層次的「結構原因」：包括(1)資本主義下資本對教育提供優質勞動力的需求，與(2)勞動者在此之中透過教育競爭進行階層競爭的必要，甚至也包括(3)資本主義國家為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而進行教育與經濟結構相配合的「人力規劃」管控，以及推動「國家中心教育」，抹煞重視個體教育的可能。這更上一層的結構原因必須面對，否則僅透過廣設高中大學，把升學管道大幅度的放寬，是將真正的結構原因影響**延後、轉移**、甚至可能**強化**，而非**改變**結構原因（如造成高教擴張與文憑貶值）。也正基於這樣可能的問題後果，分析「結構原因」的層次性，顯得相當重要。

大學主張除了關注升學機會的「量」以外，同時也關注升學機會的「質」：應當廣設高水準、尊重個體教育需求的高中大學。特別是在台灣當前高等教育顯著的「公私雙元教育系統」狀況下，高等教育容量不只是不足，且其階層化教育結構是相當「菁英化」的：將大量優質的公立教育資源，僅投注在少數經升學考試篩選的秀異份子上，而置廣大學生需求於不顧。「廣設（公立）高中大學」的政策目標將是要改變這樣的狀況，使得升學機會增加，且營造「平等化」的教育結構。難道，一個廣大且資源平等化的教育結構，既滿足了人們的高等教育需求，又將各種資源平等分配，這樣還無助於減小整體升學競爭壓力嗎？

對於這樣的問題，我的回答是：有一定效用，但仍有相當多的**限制**。首先，廣大且資源平等化的教育結構，不代表就能「滿足人們的高等教育需求」；特別是因為，人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教育需求，除了本身的「求知慾望」外，更是一種「**競爭性需求**」：**競爭性需求的滿足來自與他人的比較，競爭結果的平等並無法滿足此種需求，而僅將導致競爭者尋求進一步的延長競爭**。並且，儘管是廣大且資源平等化的教育結構，基於國家與私人資源的有限性，其在各階段教育的數量分配和資源分佈上，仍有**必然的「階層化教育結構」**：例如不可能提供每一個人皆有取得博士學位的機會。於是，「向上競爭」、「取得競爭力」的需求，仍有化為升學競爭壓力以滿足的機會。或者，平等化的教育結構的確減弱了升學競爭壓力，但這樣的壓力仍可被「轉移」：改由僱傭勞動前教育以外的其他領域進行競爭，如證照、社會人脈、實習經驗…等；這些競爭的內容的確和學校教育的升學競爭不同，但要「分出高下」的基本內涵是不變的；只不過，其內容可能較傾向「實務性格」，與實際的僱傭勞動有更強烈的親近性，如此能縮短投入僱傭勞動時的「適應過程」，且在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因較明確達到資本需求，而減短競爭時間長度的部分可能。

綜合來說，依循前述提到資本主義社會造成升學競爭壓力的三個原因，爲了要能夠對其徹底改革，我們可以指出，面對**升學壓力真實「結構原因」的改革目標至少包括了三點**：

- (1) 去除資本需求與其對勞動力的影響
- (2) 平等化的階層結構
- (3) 教育（財務與文化）資源分配的平等化

而「廣設（公立）高中大學」此一政策理念，能一定改善達成(3)教育（財務與文化）資源分配的平等化，而部分地減低升學競爭壓力；但假如光僅如此，不以其他方法追求(1)與(2)的目標，其結果仍難撼動資本需求與階層結構影響下，僱傭勞動者於僱傭勞動前競爭的壓力，而使其必須繼續透過更高層級的教育機會「向上競爭」，或轉移至其他領域進行競爭。整體來看，被減少的升學競爭壓力仍相當有限，其若非被「延後」了，就是被「轉移」到教育以外了。

接著，讓我們繼續來討論「升學機會說」的第二個主要論點：「反對人力規劃與強制分流教育」。

## 2.4.對「反對人力規劃與強制分流教育」的批評與回應

對台灣九零年代教育改革的論述仔細考察，我們將發現，對過去「人力規劃」不當而造成強烈升學壓力的批評，幾乎是民間、教改會、及官方部門最共通的觀點；其一致性遠勝於對「廣設高中大學」的支持。

教改會對台灣教育問題的診斷中，即不斷對過去人力規劃提出批評，並指出是政府對「高中/高職」的強制比例控管（3:7），導致了強烈的國中升學壓力，才會產生了「一元化的聯招制度」用以分配升學機會：

…（過去）高級中等教育長久受到政府「人力規劃」影響，造成高職過份膨脹，高職與高中容量比例嚴重失衡。83 學年度國中畢業生 38 萬餘人中，只有 21%有機會進入普通高中，12%進入高級補校，45%進入高職，9%進入五專，13%為其它。進入普通高中的機會實在太低了，升學壓力之大，使得國中教育成為大多數家庭的夢魘。為了追逐那稀少的升學機會，於是競爭激化，不得不用日益周密而一元化的聯招，來執行升學機會的分配任務，對國中教育造成相當程度的扭曲。不但教學上深受考試的引導，而且衍生了不按課表上課、違規能力分班、以參考書代替教科書、不斷考試和惡補等現象。（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b: 28）

並且，其也指出，人力規劃的觀念來自於政府將教育作為「手段」，強使教育系統「配合經濟發展結構」，而「忽略了個人的發展和教育需求」：

戰後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受經濟發展相關的人力規劃觀念影響甚深。因此在各種教育的數量與類型設計上，大多把教育當作手段，視之為提高生產力、增加所得的投資。在這種做法下，個人的發展方向與機會，不免受到極大的限制。教育改革並非不考慮就業問題，而是將思想方向回歸到替每個人創造機會，讓每個人得以發揮自己的潛能。個人可以自主的因應社會的變遷與需要，作適性的選擇。如此一來，人人覺得自己有前途、有出路，而社會也不會缺乏所需的人才。（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c: 18）

除了指出「人力規劃」造成了嚴重的「教育問題」外，教改會與民間教改團體也大都認為，由政府高度控管的「人力規劃、強制分流教育」，隨著「**經濟結構**」的快速變遷，已不合時宜、無法面對更迅速、更強烈的全球性經濟競爭和職業需求變遷。而主張應該改為「加強基礎能力」、「滿足個人的教育需求」、「減小強制分流」的教育結構，而將變遷快數的技能訓練需求交由「職前訓練」或「在職訓練」來完成。教改會即提到：

過去職校之大量發展，主要是受到人力規劃的導引。檢視台灣過去所做的人力推估，發現誤差極大，相當不可靠。若據此而做長期或短期的計劃教育，顯然不可行。隨著經濟型態的轉變以及產業技術的發展，今天的問題關鍵可能還不在於計畫教育是否可行，而是在於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職業變遷更為快速，個人一生中將面臨多次行業轉換，因此教育體系應培養的是更一般的，更有調適能力的人，而不是更專業，更難以轉換的人才。…在高職（或五專前三年）的教育階段，應加強基本學科能力的學習，培養其適應能力與學習能力，加強其職業倫理與敬業態度的涵養，而不是熟練一些可能不久就會被汰換的技能。至於產業界所需的熟練工，則應改為由職訓局培育及由業界加強在職訓練計劃，自行培養。教育當局與業界都應充分體認「職業教育」與「職業訓練」所應有的分工。（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b: 29）

代表民間教改觀點之一的黃武雄也站在「未來的經濟形態變幻莫測」的觀點上，提出教育應當盡量滿足人民需求、提升其內在素質：

台灣夾在多重國際勢力詭譎多變的交會點上，未來的經濟形態變幻莫測，誰都無法預估二十年後的人力需求。相形之下，教育的目的最為明白，讓每一個人都有充分的機會提升自己的內在素質。**由眾多高素質的個人，共同去因應未來世界的變局，去塑造未來台灣社會的面目，便是最可靠的人力規劃。**（黃武雄，1996: 61，**重點**為原作者所加）

總結來說，九零年代教育改革基於(1)學校教育因之激烈競爭，(2)經濟結構快速變遷，普遍提出了「反對人力規劃、強制分流教育」的訴求。然而，回到本論文提出的觀點，我們在此的提問是：究竟「人力規劃」與「滿足教育需求」兩者之間，對「升學壓力」是否真是兩個不同的影響方向？又或者更根本的疑問是：這兩者是「根本對立的觀點」，還是其實有相當多的「共同性預設」？

首先，「反對人力規劃」的教改論述中，將政府以「人力規劃」對教育結構控管的作法，視爲是「**教育系統配合經濟發展結構**」與「**個人的發展和教育需求**」之間的**對立**，而批判「將教育符應經濟」導致「教育不正常化」的惡果。最常被提及的例子即是政府控制「高中/高職」的比例爲3:7，被普遍視爲是將教育系統作爲手段配合經濟發展，而忽略了多數國中生想朝高中與一般大學升學的教育需求。但是，必須追問的是：「個人的發展和教育需求」不正是受到「經濟結構」高度的影響和限制嗎？倘若經濟結構需要的即是具有偏重於特定領域知識內容的勞動者，例如當前台灣所需大量的電子工程師，或早期所需的大量基礎勞力工作者，而其他的工作不被重視、或缺乏就業機會，就是放棄「人力規劃」、不斷擴張教育機會，又如何能使人人都可自由地追求「個人的發展和教育需求」，而不受限於「現實考量」——得唸一個找得到好工作的學校和科系？

實際上，「人力規劃、強制分流」與「提高教育機會、延後分流」都是一種

面對經濟結構的「**教育管制**」，都具有將教育視為「**手段**」的性質，差別僅在於競爭的提前或延後；並且，在教育的目的為競爭得到「高階層的教育和文憑」以取得「上層工作機會」的前提下，儘管「提高教育機會、延後分流」，只要還未「分出高下」，「**教育的需求**」仍是永遠不可能被滿足的<sup>13</sup>。根據本論文前述提出的觀點更清楚地來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僱傭機會競爭與階層競爭劇烈的強況下，勞動者必須盡力地在僱傭勞動前投入升學或其他領域的競爭，並高度地配合資本需求來規劃其競爭內容，才有機會取得滿足個人需求的「好工作」。是故，儘管政府不進行人力規劃，勞動者也將自動地依資本需求「**規劃其人力**」；儘管政府不提前在教育系統中進行強制分流，勞動者在後續的升學競爭與其他領域競爭中，也將依其競爭成果「**被迫分流**」。或許，在長期的競爭之下，部分較缺乏「競爭力」（包括出身背景較差及其在學校教育中競爭失利）的人們將自我認知到：再競爭下去也很難有成為上層勞動者，所以「選擇」成為基礎的下層勞動者，形成了一種以「**自然分流**」掩飾「被迫分流」的假象；但是，這絕對不是完全基於其自由意志、滿足其個人發展與工作需求的「**自願分流**」。使部分人競爭失利後自甘下層的「自然分流」與政府強行在教育系統中劃分階層的「強制分流」，其實本質一樣，都是僱傭勞動者在僱傭前競爭的**非自願結果**，也都是資本主義階層結構下將勞動者分層的**必然現象**。

然而，儘管認識到社會競爭的現實是必然的，「反對人力規劃和強制分流教育」的人們仍可能會回應說到：將分流延後、提供更多多元的教育機會，至少能給人們更多機會探索自己的性向，使得人們有「**適才適性**」的多元方向發展，而不需在學校教育的早期階段（如國中升高中職）進行「單一化的競爭」。是故，「多元發展」後的競爭程度，當然不同於「人力規劃下的強制分流模式」，能減低升

---

<sup>13</sup> 關於「提高教育機會」、「延後分流」的政策想像中，官方甚且提出了一個將競爭「超出學校之外」，以「終身學習機會」來解消「升學壓力」的邏輯。教改會即提到了：「學校之外教育的忽視，及教育資源過度集中於學校，乃造成文憑主義，終身的學習被限定為「升學進階」的學年制中，造成學習時段的「塞車」，助長了「升學主義」。…（而）終身學習涵蘊對學習主體的尊重，提供所有學習者一生學習的機會（life chance），強調全人發展，重視個人自由發展，使教育成為一種生活，擴展人生的意義與目標。這種學習當可減輕文憑和學歷的偏執，和緩升學主義的壓力，以及有助於教育權力的下放，凡此亦有利於學校教育的定位及功能的發揮。」（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b: 16-18），以本文的觀點回應，試圖以終身教育解消升學壓力，恐怕仍將緣木求魚。因為(1)對於勞動者而言，之所以必須投入升學競爭，是為爭取僱傭勞動和在較高層級中勞動的機會，而得在「僱傭勞動前」就先爭奪優質勞動力品質和證明的競爭壓力，來期待在僱傭徵選過程中雀屏中選。所以，「**僱傭勞動前**」的「**學校教育競爭**」即具有著相當的**關鍵性**，不因有「終身學習機會」而改變；並且，(2)「終身學習」仍需要其**社會基礎**，特別是僱傭勞動後必須有充足的閒暇時間，才能投入終身學習的歷程。然而，對於台灣的工人階級而言，其平均勞動時數已是全世界第三，期望其透過「終身學習」機會能對工作產生流動效果，而不需提前投入升學競爭，有相當的困難。再者，我們也可以預見到，儘管「終身學習」的確取代了部份「學齡學校教育競爭」的功能，其仍然只是把升學壓力延長到了「終身學習壓力」上，並未真實解消問題。

學壓力、甚至分化職業競爭的壓力<sup>14</sup>。

這樣的論點值得我們進一步提問：在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下，所謂「適才適性」的多元方向發展，究竟是一種僅單純基於「個性」的發展，還是同時也受到「出身背景」與「經濟結構需求」高度的影響？儘管「延後分流」、「增加教育機會」的確可能增加個人探索性向的空間，但其「發展方向」能否多元，實際上是高度受制於「經濟結構需求」，而非「個人的性向」；舉例來說，在國家提供長時間多元的教育機會後，可能更多的人們在其中挖掘出了自身在藝術上的興趣，但經濟結構中資本需求的內涵若未改變，仍然沒有辦法支持那麼多人投入藝術工作，自然也無法讓人「自由選擇自己的性向」，而減少投入主流資本需求勞動力的競爭。「透過多元教育發展多元性向，而發展出多元的工作機會」的理想，僅能是相當小的一部分，而實際上是不合於資本主義社會中「賣方/資方市場」的僱傭勞動關係事實的。並且，諸多教育社會學研究也指出，增加教育機會的「高等教育擴張」，並無法有效提高「教育機會均等」，減低「出身背景對人教育發展上的影響」（Shavit, Yossi & Hans-Peter Blossfeld, 1993）。倘若如此，可預期社經地位差的子女，仍將受其出身背景影響，只能發展「有限的性向」，且仍居於階層化教育結構中的下層；而社經地位高的子女，儘管能有較多的發展機會，但仍必須受制於資本需求的經濟結構，而投入符合「上層勞動者」的「特定性向」。於是，競爭結構仍然是高度單一的，甚至競爭的長度將拉長，且對於社經地位差的子女，更難在長時間的競爭中取得「流動」的機會，或是必須為其投入更激烈的競爭（包括升學考試、與繼續升學所需的財務資本、與其他領域的競爭）當中。

所以，究竟「延後分流」能否比「強制分流」減少升學競爭壓力？總的來說，我的回答如同對「廣設高中大學」效果的答案一樣：其僅能對某一階段（通常是先前階段，如國中、小）的升學壓力減小，但整體而言，升學壓力將會延後（到高中、大學、研究所），或者轉移到其他領域（如證照、社會人脈、實習機會...

---

<sup>14</sup> 在此類「發展多元化教育機會」、讓學生「適性發展」的論述中，「提升技職教育」、「發展實用型大學」始終是官方附帶的政策規劃。其隱含著認為：升學壓力的原因是技職體系缺乏資源、又不受社會重視，使得長期學生避免進入技職體系，而產生了相當大的升學競爭壓力，必須擠入高中、大學窄門。為節省篇幅，我僅在此對此論述作一簡單分析：實際上，台灣「技職學生」遭遇的壓迫來源仍是「僱傭競爭」和「階層競爭」：人們努力競爭「僱傭機會」，並最好成為「上層勞動者」，而避免位居「下層」，只不過在台灣教育制度的歷史發展中，技職體系被定位成了階層化教育結構中的下層，符應未來的下層勞動；或許我們可靠「分流政策改革」而改善技職體系地位與技職學生處境（如減少技職生、增加技職資源），但這仍無法改變「階層化教育結構中的失敗者」——缺乏好文憑證明其具有優質的勞動力的人——必然存在，而這就是「競爭結構」的本質，只不過這些人未來可能不在技職體系罷了。只要不改變(1)階層競爭：社會不平等階層結構下的稀有高工資；(2)資本需求：要求勞動力品質競爭，劣者失業。(3)教育（財務與文化）資源分配的菁英化，升學競爭壓力就無法解消。只因為，打造「兩條國道」（借用台灣前教育部長吳京的用語，指平衡發展普通與技職體系的資源和其高教機會）的想像，最終仍必須在勞力市場的競爭上碰頭，而勞力市場的競爭是「一元」的，依據文憑與能力優勝劣敗的。

的競爭)。並且，我必須指出，不論是「人力規劃的強制分流模式」或「提高教育機會的延後分流模式」，與「廣設高中大學」一般，都沒能挑戰資本主義結構下的僱傭競爭與階層競爭此二升學壓力「結構原因」，而無法達成(1)去除資本需求與其對勞動力的影響；與(2)平等化的階層結構的「結構性改革目標」；導致真實的「結構原因」仍高度影響了台灣的學校教育，使得「適才適性」、「多元發展」的理想，在單一化、劇烈化的競爭環境下，根本不可能發生。升學競爭的壓力也才會揮之不去，甚至延長、加劇。

## 2.5.對「讓孩子從小競爭過於殘酷」的批評與回應

儘管上述我們提出了對「升學機會說」的諸點批評，不過，對於「升學機會說」、「廣設高中大學」、「延後分流」的教改支持者，往往暗含了一個「價值選擇」的差別：**將競爭壓力延後總比提前在孩子身上發生來得好，讓孩子從小競爭過於殘酷。**這樣的「價值選擇」使得其儘管認知到諸多教改方案只能延後競爭、沒能實際挑戰結構原因，但仍是相當支持「升學機會說」的教育改革。我認為這樣的「價值」相當關鍵，其同時也就是「升學機會說」支持者的一種基本「**規範性立場**」，導致了其與本論文之間對問題判斷的根本差別，我們將繼續來對其進行分析。

黃武雄的論述，是這樣觀點的代表，其配合一貫對「廣設（公立）高中大學」和「盡量提供教育機會」的政策訴求，而主張：儘管有競爭壓力，也應盡量延後，由較成熟的階段來承擔，為自己未來作抉擇：

…「廣設高中大學」正是要讓人透過自由選擇去調節技職人力的供需…面對「社會分工」的現實，**我們所反對的並不是分流，而是太早分流與強迫分流。**…論者或謂這麼一來，升學主義便會延伸到考研究所的階段。但這時人已長大，面對競爭去爭取自己更大發展的機會沒有什麼不好。況且這時他會有較成熟的判斷能力去面對自己未來的抉擇。不像目前早在十二、三歲便須面對殘酷的升學競爭，卻無充分自主的能力與機會，去選擇自己的未來，包括拒絕升學。（黃武雄，1996: 64-65，**重點**為原作者所加）

…**教育手段無法消弭人類社會的階級差距，我們能做的只是提高階級流動率，放寬進入菁英階級的門戶**，例如廣設高中大學，使社經地位教低者的子女比起以往可以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這並不是說我們贊同階級差距，相反的**我們坦於承認現實世界確實有階級差距，而主張在教育線上應盡量保護我們的兒童**，使他們在長大之前不致因其先天條件的不利而減少他們自由選擇教育型式（例如技職或大學）的機會。（黃武雄，1996: 71，**重點**是我加的）

對於黃武雄提出的論述，我實際上相當可以理解，「**兒童**」的確在各種層面

上有必然的弱勢性，且對於關心教育的人們來說，對「兒童」具有規範性上的優先關懷，是相當正常的；同時，這樣的論述其實也是一種「在資本主義社會前提」下的某種「務實策略」：既然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則可能無法改變，而將有必然的競爭，但也盡量不要使其殘害孩子的童年，才能「將傷害降到最小」。

但回到本論文的觀點，我們仍要謹慎地分析，究竟將競爭延後，對兒童和其未來有什麼樣的影響？兒童就能擁有快樂的童年嗎？以及，回到「價值選擇」的問題，究竟這樣「讓孩子從小競爭過於殘酷」、而接受「由其成熟後再來自主承擔、選擇」的觀點，是否已是最適當的價值安排？有何值得批判之處？

首先，我們知道，只要是為了符合資本需求勞動力的競爭，就是異化、不自由、殘酷的。或許有人能在成熟以後，隨著自己的「性向」，而較為快樂地投入勞動力品質競爭當中；但是，所謂「自己的性向」，也是高度受到社會環境經濟結構所限制的。因為符合「性向」這樣「較快樂地競爭」，毋寧仍是一種「隨著自己的個性」的論述影響下，「製造甘願」規訓後的「異化（求學）勞動」。我們也一再提及，實際上，延後競爭所受到的壓迫程度，不亞於提前競爭；反而可能增長了競爭的長度。

延後競爭能讓孩子擁有快樂的童年嗎？有這樣的可能，但我想倘若未來的競爭相當激烈，這樣的快樂不能夠太久，而且將只能成為成年以後，產生一種「童年鄉愁」：「啊，還是當小孩好！」，但對改變總體競爭壓力沒有幫助。隨著孩子的長大，他將認識到這個社會沒有想像的美好，各種的競爭壓力將接踵而至；對於熟悉勞動力競爭規律的家庭而言，其為因應為了激烈的競爭，也會主動為其孩子提前以各種方式（如補習、參加各種高文化價值的活動、培養競爭態度...等）投入競爭行列，只因為「不要輸在起跑點上」。甚至，成熟後的競爭總是有一種「正當性」：這是你自己長大後，「沒有人逼你」自己選擇的結果。但真的沒有「結構」驅力逼使人拼命努力競爭嗎？只是在「延後競爭」的論述上，恐怕將正當化了這種競爭，甚至欣賞競爭使人們不斷提高勞動力使用價值，創造了一個「豐饒的資本主義社會」。孩子快樂的童年，和其後劇烈的競爭，可能換來的是對童年永遠的緬懷，但也包括了對現實持續的無奈。

並且，儘管假設「壓力」的確能從「兒童」延後到他的「未來」：青少年、青年、成人的階段。但是，這樣「延後較適當」的價值選擇，的確適當而無需批判嗎？黃武雄（1996: 64-65）的論點認為：「人已長大，面對競爭去爭取自己更大發展的機會沒有什麼不好。況且這時他會有較成熟的判斷能力去面對自己未來的抉擇。」，說明了其「價值選擇」的「適當性」。但實際上，嚴肅地面對成人與兒童的差異：不但人「成熟後」為了**求取生存**，仍然並沒有真正「自由選擇」的餘地，而且，一個人年長後不代表其即更經得起競爭、異化、與壓迫；相反來說，讓孩子即競爭，真的是那麼地殘酷嗎？孩子面對競爭壓力，實際上也有著**選擇的空間—放棄學業、放棄競爭**，儘管可能將受到結構性的懲罰，但至少不會立刻使

其面臨「無法生存」的壓迫，倘若在競爭遊戲中自我放棄，在「進入職場」或「確定失業」前，其反而還有好一段的「悠閒時間」，使其可能比面對「延長競爭，但最後仍有人失敗」所帶來的壓迫還少。另外，假如資本主義社會中必然有人將在競爭中失利，而飽受壓迫，成為「產業後備軍」以威脅其他人「過度勞動」的話，那麼，「早點決定這群受壓迫者」、甚至「減少流動機會」，是否真的就是一種「菁英主義的意識形態」？還是這個體制的真實本質？對我而言，競爭分流的先後並沒有真正的差異存在。反而是流動的困難，更可能讓人徹底看清這個體制透過「流動存在」加強正當性、鞏固剝削的運作邏輯，更有可能讓人提早結束僱傭前的競爭，投入真實能改變體制的行列之中。除非，我們認同「隨著年長，自己的失敗要自己來負責」的「**功績主義——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而僅支持「兒童期間不要競爭，因為他的失敗比較受環境影響；但成人的競爭成敗、甚至有人失業則是合理的，應當自己負責」的「**機會平等階層流動**」觀點，否則問題當然在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本身，而不是向上流動的機會平等，或競爭的提前或延後。

我並非認為，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成人社會勞動者間相當競爭，所以就不該有個「快樂的童年」，甚至將早期學校教育階段的壓迫給合理化了；容我再次說明：我認為台灣學校教育升學壓力的「結構原因」，不只是來自於升學機會多寡與階層化教育結構的型態，而是來自其背後在資本主義下的僱傭競爭和階層競爭需求。只透過「延後競爭」追求「快樂的童年」，但不面對競爭壓力的「結構原因」，及其壓迫的延長和強化，不但改變不了問題的根源，「快樂的童年」也必將縮短，甚至，很可能「正當化」了競爭壓力和其原因，而這正是資本主義能賴以維繫的關鍵社會條件。

總的來說，我認為試圖要減小升學壓力的改革措施，除了透過調整階層化教育結構和改變競爭的時間先後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改變資本主義社會基於資本積累需求對勞動者產生的「僱傭機會競爭」與「階層競爭」壓力。唯有解除了勞動者為此在僱傭勞動前競爭的壓力，升學壓力才有可能真實解消，而非被延後或轉移。否則，迴避了面對結構性問題，不但將使問題長存，甚至可能模糊了認識問題的可能，使改變更加陷入困境。或許我們可能對巨大的資本主義結構容易感到束手無策，也很難想出其出路所在；但這樣的**困難過程**，正是在知識與行動上追求真正的結構性變革。如同前述四二零教改聯盟（1996）的引言指稱：「我們不缺教育改革者，而是真正的改革者！迴避結構性問題的枝節改革，終將失敗。」

### 第三節 台灣升學主義教育的「特殊壓迫原因」

結束了上一節對「升學主義說」和「升學機會說」的批判回應，我指出了台灣升學壓力源自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原因，及應當改革的方向。然而，我相信這樣的分析會讓人自然產生一種疑問：如果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就必然會產生升學競爭壓力，那麼，為什麼台灣升學競爭產生的壓力和問題，卻似乎超出其他國家

許多呢？特別是歐美國家，也是奉行資本主義的國家，為什麼他們的教育沒有像我們這樣的問題？究竟在資本主義這個大傘以外，台灣升學競爭的壓力，還有什麼樣的**特殊來源**，導致**台灣升學主義教育的「特殊壓迫原因」**？

的確，「資本主義」不會是所有問題原因的解答。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揭露資本主義對現代社會的影響，但並非認為所有的現代社會現象或問題都源自於「資本主義邏輯」。我們在探尋任何一個社會現象的結構和機制時，必須秉持其處在一個「開放系統」的概念，受到諸多因素影響，才能徹底掌握社會事實，也才不會陷於特定的「**決定論**」（如經濟決定論）中。但是，資本主義運作規律的影響也並非完全是直接的、表象的，而是會有所變遷，並且將滲透到國家、制度、與社會文化之中。所以，當我們嘗試要在「資本主義邏輯」之外，找尋台灣升學競爭壓力的特殊來源、特殊性，我們也必須分析這些特殊性與「資本主義」是否存有一定的機制關係，才能掌握其全貌，而非將社會視為無限斷裂且無法解釋的研究對象。

在此，我嘗試提出七項「台灣教育的特殊壓迫原因」，來解釋在前述直接的「資本主義邏輯」以外，台灣教育有什麼樣的特殊性，導致嚴重的教育問題與升學競爭。並且，我也將嘗試說明這七項「特殊壓迫原因」，與「資本主義邏輯」間可能具有的關係，來掌握資本主義在台灣教育中，「延伸」出的影響效果。受限於歷史研究尚為不足，我無法在此處理每一項特殊性可能的形成原因，然而，從事後的結果探析，基本上我認為，這七項強化了台灣的升學競爭壓力的特殊壓迫，皆仍與資本主義發展邏輯具有相當的親和性。

以下是我嘗試觀察得到，七項台灣教育的「特殊壓迫原因」：

### (1) 階層化教育結構的「菁英化」與「私校化」<sup>15</sup>

這特別展現在台灣「高等教育」的資源分配上。長期以來，台灣高教資源集中在公立大學、特別是極少數的明星公立大學上；而政府以大量鼓勵私人教育資本興學，來滿足人民的高較需求。這使得這些公立大學學費便宜而品質又好，但

---

<sup>15</sup> 前述提到，「階層化教育結構」指的是一個教育系統中各層級教育的**數量結構與資源分佈**狀況。我們可以依其「階層化程度」，將此概念區分為兩種模式：

- (1)階層化結構強：指升學機會低且資源分配菁英化。這樣的結構將導致「提前競爭」。
- (2)階層化結構弱：指升學機會多且資源分配平等化。這樣的結構將導致「延後競爭」（繼續升學或在其餘領域就業）。

然而，台灣的「廣設高中大學」、「高等教育擴張」的過程中，因其特殊的「灌水、升格、私校化」擴張方式，使其並非單純走向「階層化結構弱」的模式，而是從「升學機會低且菁英化」的標準「階層化結構強模式」，走向「升學機會多且菁英」的狀態。這樣既讓升學機會擴張，但仍保留菁英化資源分配的教育結構，依然使階層化相當明顯，甚至是上下幅度拉大了。其結果將保留「提前競爭」，但又增加了「延後競爭」。

數量卻相對地少（台灣目前高教公私校學生整體比例大約是 1.4 : 3.6，也就是 100 個高教生中，只有 28 個人能就讀公立學校）；而絕大多數學生必須就讀私校，其缺乏政府的補助和充足私人資金的挹注，導致必須依賴學費辦學，結果是學費貴但品質和資源仍差公立大學一大截。此種高等教育「私校化」，且將資源菁英化地集中在公立學校當中，形成了公私學校之間相當大的資源差距，也激起了強烈的升學競爭壓力，可堪稱是「公私雙元教育系統」。相較於歐美國家以公校為主、私校為輔（甚至幾乎沒有私校）的高教系統，此種高教模式可說是一種「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除了台灣以外，東亞的南韓、日本，都有此類的高等教育結構，而造成了國內強烈的升學競爭壓力：不只要能接受高等教育，更是要努力競爭接受優質的公立高等教育。可以理解的是，這牽涉到台灣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後進性質」使然，導致政府在六零年代大量興設專科學校以配合經濟發展時，缺乏充足的資源，而只能運用私人資本以「**粗廉主義**」（借用黃武雄的用語）的方式來辦教育。然而，在九零年代的教改浪潮中，儘管台灣已晉身「已開發國家」，卻依然保留高度私校化、甚至進一步更邁向私有化的高教結構，這就牽涉到了台灣特殊的「私人教育資本」力量。

## (2) 私人教育資本的強大影響力量

如上一項所述，台灣高等教育的私人教育資本(私校)部門相當龐大。但除了其掌握了相對多數的學校量和學生數以外，更關鍵的在於，台灣私人教育資本的政治影響力相當大，使得政治部門屢屢須向私校妥協，特別在九零年代教育改革浪潮中，協助其擴招、擴建、升格、改制…等，導致台灣高等教育的持續私校化，連帶繼續鞏固了原有的菁英化資源分配結構。另一方面，非學校型態的私人教育資本（包括了補習班、參考書社、教科書商、測驗卷商、考友社…等）在各層級的教育領域，也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原先這些機構多是隨升學主義而起，但隨著其不斷擴張，現今甚至已可刺激、強化升學主義，藉此以獲取利益。「私人教育資本」對學校教育的影響，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般資本需求」。「私人教育資本」關注的是直接自教育過程中「獲利」，而不同於期待教育生產優質勞動力，使其能在未來僱傭過程中增加剩餘價值的「一般資本需求」，所以這兩者間將存在一定的緊張關係：特別在學生來源充足不斷的情況下，私人教育資本的擴張僅為了收取更多的學生和學費以獲利（或賣更多的參考書、測驗卷）、但不在意教學品質與成果，而可能仍無法提供資本需求的勞動力品質，使得學生仍要接受進一步的教育和訓練，產生了持續擴張教育的需求。

## (3) 高強度的政治控制教育運作

一直到九零年代末以前，台灣的國家機器對於學校教育具有相當強烈的政治控制運作。包括進行統一升學考試與學位授予，藉此以強制推行標準化課程、標準化教學、大量的測驗準備、和使學校受其控制並相互競爭；導致國家能實際控制學校教育的運作，也促成單一化的升學競爭結構，而減少「教育與經濟結構不

配合」、「新教育導致批判思想」的政治動盪可能。台灣在此方面的強度，及其對學校教育內容遺留下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使得台灣升學主義的內涵，必須將「政治控制」因素考量在內，才能理解「國家為何將教育結構與內容中介為如此」，甚至「部分有違資本的實際需求」（鄭婉琪，2002）。然而，國家強行的「政治控制」，除了穩固自身的正當性外，也有可能用於符合「資本需求」；特別是在全球資本快速流動的年代，國家紛紛對教育結構進行「表面自主」、「實際控制」的「新管理主義」改革，使得政治控制更加細微，讓學校組織和課程運行配合國家的指示，進一步競爭品質，以滿足全球資本的需求。

#### (4) 高文憑者多數可進入公部門

配合前項「政治控制」的需求，台灣龐大的公部門多數以一定程度的教育文憑作為參加考試和徵選的必備條件，而使得取得高文憑者，儘管其所受到的教育內容不合於資本需求，但也能選擇以考試進入公部門工作，實際上，諸多公職考試的內容也與大專院校課程息息相關，出題者也多數在專任和兼任教職；並且，國家機器也給予這群公職人員依職等和學歷相當高的福利，以此達成對高知識分子的政治籠絡/控制；也正因此，其間接強化了台灣的升學競爭和高教需求。實際上，除了「政治籠絡/控制」的功能以外，國家將高文憑者納入公部門中，也是一種協助「資本需求」的「調控」：特別當資本需求是「基礎勞動力」時，公部門吸納了高文憑者，能使整體勞動結構不致於過度失衡。

#### (5) 學校的單向度升學競爭文化

基於長期以來，台灣學校受國家強烈的控制影響，「升學成效」甚至成為了政府對學校/校長/老師給予賞罰「或明或暗」<sup>16</sup>的一種依據，而產生了強烈「為準備升學而辦教育」的學校文化；另一方面，部分校長與教師也的確能透過「提高升學率」，而能因此自家長和學生中獲得各種利益；再者，實際上台灣戰後長期以來學校教育一直具有相當的「官僚文化」和「組織惰性」，而始終缺乏批判與理想教育的文化。…多重的因素使得台灣的學校教育產生了「單向度的升學競爭文化」，也就是王震武與林文瑛（1994）所批評的：「學校一切活動的目的都該是在為升學做準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不惜違反法令規章和公認的教育原理。而這就是台灣特有的升學主義<sup>17</sup>。」（轉引自張郁雯、林文瑛，2003: 168）也正因

---

<sup>16</sup> 國家這樣的運作往往也不能過於「明白」，否則可能將有損其「反對升學主義、要求教育正當化」的表面正當性；然而，各級學校校長的調動、升遷，長年來以「升學成效」與「政治控制成效」來予以評判，的確一直是台灣教育環境中一種「潛規則」。

<sup>17</sup> 儘管台灣這樣的特殊學校升學文化，相當程度地使學校教育不正常、強化了升學競爭，但我們還是必須注意到：在其他條件不變下，進行所謂「正常化的學校教育」，雖然能在學校內減少升學競爭，維持一定的教育內涵，使其「與考試脫鉤」；然而，如同日本，升學競爭壓力可能將會「外造化」，改由校外的補習班、教育機構…來維持，而更加強化了競爭的「私有化」與「商品化」的邏輯（儘管因學校的正常化，這樣的競爭強度可能將減小）。台灣以學校教育

此，增加了台灣學校教育內爲了升學競爭而進行異化求學勞動的強度；而這樣的學校教育模式，儘管並非完全符合資本主義需求（特別是高階層、需要高創造力與多元能力的研發與管理勞動力），但無可否認地其打造了普遍性馴服的勞動者，且透過升學層級，使其內化了資本主義運作中不可避免的「層級權威」。

## (6) 教育與文憑勝過職業和收入的「特殊地位性」

台灣教育不只是因爲其能帶來好的職業與收入，而受到各方重視與激烈競爭；其本身就代表著特殊的「地位」，這反映在我們社會中高度以「文憑高低」來評判一個人的「知識」、「品德」、「水準」...等。

我國教育社會學學者黃毅志即透過研究指出：

在台灣社會裡，教育除了對於職業、收入往往有重大影響，可作爲提高職業、收入的工具之外，其本身也代表著很重要的階層區分，甚至於很有可能就是最重要的階層區分，這反映出台灣社會特別重視教育的特殊文化傳統。（黃毅志，1998）

然而，相對於對此以「文化傳統因素」、「士大夫觀念」、「不理性的升學主義」造成教育具有特殊地位的歸因方式，我則有不同的觀點。我認爲，台灣社會中「教育」之所以能據有特殊地位，除了因爲其所能帶來的「實際好處」（如未來財務資本的增加）以外，更是基於台灣在學校教育中深沉地打造了「**優劣排序意識**」，這樣的運作過程所造成的結果。學校教育中強烈地**正當化**了「優勝劣敗」的競爭淘汰機制和其區隔結果，導致其中競爭失敗的人們**自我認同其失敗**是基於自己「不夠聰明、或不夠努力」所造成，也同時認同了競爭成功、取得高教育機會與高文憑一群人的「正當性」和「優越性」，才形塑了台灣社會中教育和文憑的「特殊地位」。這是每日在學校教育中**實際的文化實踐**所造成的，而非抽象、無法捉摸的傳統文化即能鞏固。所以，真正能徹底壓迫受壓迫者的教育體制，是要使其能對取得高教育、高文憑的競爭勝利者——知識份子進行「**神聖化**」——產生難以言喻的「自願性服從」，才能使體系成功不斷運作，以配合其「結構原因」的需求。台灣的學校教育，正是有著這樣的特殊性。而如上一項所述，這樣深沉內化的「優劣意識」，也正符合了資本主義「層級權威」中對下層勞動者的服從意識要求。

## (7) 不必要的競爭結構繼續運行

最後，我們發現，儘管在某些階段教育機會已充足，甚至超過了對其的升學需求；然而，國家的中介與學校和民間的競爭心理，卻仍然支持其維持不必要的

---

之力協助升學主義，是一種特殊惡化的升學主義（王震武、林文瑛所言），這是事實；但升學主義的「結構原因」，以及學校外的「私人教育資本」若未面對、挑戰、與管制，僅辦理「正常化學校教育」，仍有其限制，特別可能提高教育費用，而強化基於「財務資本」、「社會資本」差異而來的「階級社會的再生產」。

競爭結構，繼續進行**缺乏實益的「分出高下」**運作，甚至擔憂「沒有升學考試，學生豈不就不唸書了！？」。台灣當前的升高中職階段仍繼續依考試能力進行「能力分校」，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儘管高中職的容量已足夠所有國中生升學，但國家仍維持其間相當不平等的資源分配（特別在公私立學校之間），以及舉行統一入學測驗，進行「能力分校」而創造出了「明星高中」<sup>18</sup>；然而，高中職的學歷在當前幾乎已不足取得職場工作，是故其中絕大多數的人們仍得在高等教育階段，再次依考試能力競爭入學，再運行一次「能力分校」。很明顯地，這樣的運作缺乏了效率和實益，反而導致學生們在國中階段就要投入升學競爭，且這競爭必然地要至少持續到大學入學競爭才能結束。但升高中職的「統一考試競爭」、「能力分校」、「明星高中競爭」的「不必要競爭結構」，仍然相當地受到台灣社會的接受，舉例而言，2007年教育部推出「十二年國教」、讓高中職「免試入學」的方案，未能受到社會的普遍支持；「明星高中」的廢除與社區化一事，更是遭受到了諸多批評。對此台灣問題的嚴重程度，可見一般。

或許值得我們再次提問的是：這樣已是「不必要」的競爭結構，對資本主義邏輯的運行仍有益處嗎？我對此的答案是：當然還是有的。所謂的「不必要」指的是對勞動者而言，其最終仍要到下一個教育階段再次競爭入學，所以沒有必要、沒有實益；但對於資本主義打造勞動力而言，持續不斷地使勞動者處在競爭當中，儘管對其勞動力品質幫助有限，但可使其徹底地內化了競爭的價值，無時無刻都使監督自己要符合未來求職競爭上的要求；又或者，持續的競爭至少在政治上分化了求學勞動者，使其團結意識問題採取行動的可能弱化，才可能維持資本主義體系的永續運行。

對於這七項台灣教育的特殊壓迫來源，或許我們可以做個總結：我們觀察到，這七項特殊性並非直接從屬於資本主義邏輯、且在相當程度上是台灣社會的特殊狀態，我們無法用簡單的單一邏輯或因素來解釋其多樣的內容。然而，我們發現其與資本主義邏輯實際上具有一定的「親和性」：階層化教育結構的「菁英化」與「私校化」、及私人教育資本具有的強大影響力量將減少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壓力，卻又能符合產業資本及辦學資本的需求。而高強度的政治控制教育運作及高文憑者多數可進入公部門的現象，則是代表了國家在其中做為一「調節者」的角色，以鞏固資本需求並吸納資本主義需求外的勞動力。至於台灣學校的單向度升學競爭文化，以及由此導致的教育與文憑「特殊地位」、和不必要的競爭結構持續運行，透過高強度的升學考試勞動與排序，提供了僱傭勞動過程所需要內化的「排序邏輯」，打造了利己個人主義式的「排序心靈」。

---

<sup>18</sup> 台灣所謂的「明星高中」，其存續的關鍵機制並非來自於其資源多寡、師資程度、或教學特色，而是來自於「入學方式」，特別是透過統一化考試創造激烈競爭而篩選出「明星學生」的「能力分校制度」。所謂「悠久的明星學校菁英傳統文化」，也是立基在「能力分校制度」長期運行的結果。在判斷該如何看待「明星高中」的教育改革時，對此「關鍵機制」有辨明的必要。

當然，這樣的一個分析可能會遭致「決定論」、「化約論」、或「功能論」的批評。實際上，我也相信台灣的此類特殊性仍受其他邏輯因素所影響，而非單單展現了資本邏輯的需要，我認為，要進一步地爬梳每一項特殊因素的具體內涵，有賴於更細緻的歷史分析，以掌握其間多元複雜的結構原因。此部分非本篇論文所能處理。相對來說，我在本篇論文要指出的是，資本主義邏輯在解釋台灣升學壓力上仍有相當的解釋效果，但卻未獲得充足的重視。值得納入升學壓力結構原因的分析討論當中。並且，台灣各種教育現象相較於外國的特殊狀態，也能一定地在資本邏輯下進行討論。我在此保留了一個較為開放的空間，其可能與資本邏輯發生衝突，而非完全展現鞏固資本發展的功能，然而，其與資本間也的確具有親和性，有著維持其持續發展的一定效果。

#### 第四節 小結

回顧前述，在第一節我透過「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描繪出 2000 年後台灣學生升學壓力仍居高不下；在第二節進行原因探究時，我指出台灣「升學主義學校教育」、「居高不下的升學競爭壓力」，其核心的結構原因不在於「升學迷思」的文化問題或「教育機會」的供需問題，而根本在於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透過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我們看到，資本主義下的一個人進入職場前，為了取得較好的僱傭勞動機會，將使其在職場前即投入各種競爭中，以獲得僱傭時的勝出機會。學校教育就是其中最關鍵的一環。

當教育需求實際上滲入了僱傭勞動前的競爭之中，教育成爲了一種「競爭性需求」，儘管再多的機會供給，仍難以滿足分出優勝劣敗的需要，競爭只將被延後、被轉化到別的領域，但不會真實被解消，因爲資本主義中階層化的勞力市場，在面對勞動力時從來不是「多元尊重」的，而是差別對待，透過逼其競爭以提高效率。我透過指出「廣設高中大學」、「延後分流」...等政策仍難以解消升學競爭問題，來強調這樣的結構原因若未被挑戰，教育改革者與社會改革者憂心的問題是不會消逝的，將壓迫從「童年」移向「成年」，表面上可能是人道主義的，但若不作其餘介入，實質上恐怕僅將強化了競爭的正當性而已。

那麼，資本主義的邏輯，真能解釋全部的台灣升學競爭壓力來源嗎？台灣的特殊性何在呢？我在這篇論文的第三節指出了七項特殊的壓迫來源，特別環繞在教育資源分配的菁英化與私有化、既有學校教育內容與文化的高度壓迫、與國家中介的失敗...等進行討論。我並未將這些因素都化約爲資本主義邏輯下的結果，但我採取的立場是，這七項特殊性的確與資本主義邏輯具有一定的親和性。其強化了台灣的升學競爭壓力，部分受資本主義邏輯所引起，部分也鞏固了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需求。若要避免功能論的批評，我們需要進行進一步細緻的歷史研究，來分析每一項特殊性背後的歷史成因與生成機制爲何，以深化對結構原因的掌握。

總的來說，我認為資本主義的因素必須被嚴肅地納入升學競爭壓力的結構原因討論中。社會性的因素要被納入教育問題的解釋之中。也正基於此，當我們在構思改革行動方案時，對於資本主義的抗爭與管制，必然是整體行動藍圖的重要一環，才可能克盡其功。否則，當結構性因素未被徹底掌握時，升學問題的理論及實踐可能只會將造成進一步的升學問題，人類自勞勞相爭中解放出來的時日，也恐將受此影響遙遙無期。

## 參考文獻

- 王震武、林文瑛（1994）〈升學制度與升學症候群〉，收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主編）《台灣的教育改革》，頁 502-539，台北：前衛。
- 王震武、林文瑛（1999）《另眼看教育改革》，台北：桂冠。
- 王震武（2002）〈升學主義的成音及其社會心理基礎——一個歷史觀察〉，《本土心理研究》第 17 期，頁 3-67。
- 四一零教育改造聯盟（1996）《民間教育改造藍圖 朝向社會正義的結構性變革》台北：時報文化。
- 行政院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a）《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諮議報告書》第一期，台北：著者。
- 行政院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b）《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諮議報告書》第二期，台北：著者。
- 行政院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台北：著者。
- 林大森（2003）《高等技職教育轉型的社會學分析—以「專科改制技術學院」為例》，嘉義縣大林鎮：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 林文瑛、王震武（1996）〈分流教育的社會效果分析〉《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專案研究報告》。
- 林本炫（1997）《教育改革的民間觀點》，台北：業強。
- 林全、吳聰敏（1994）〈教育資源的分配與管制〉收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主編）《台灣的教育改革》，頁 81-105，台北：前衛。
- 林忠正（1994）〈台灣技職教育問題與檢討〉收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主編）《台灣的教育改革》，頁 314-345，台北：前衛。
- 莊啓文（2006）《鳳山地區攤商家庭升學主義意識形態與成就價值觀之歷史社會學分析》，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論文
- 教育部，教育部統計處網站，
- <見 [http://www.edu.tw/EDU\\_WEB/Web/STATISTICS/index.php](http://www.edu.tw/EDU_WEB/Web/STATISTICS/index.php)>。
- <見 [http://140.111.34.69/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overview/brief-htm/index.htm?open](http://140.111.34.69/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overview/brief-htm/index.htm?open)>。

- 黃武雄（1996）《台灣教育的重建—面對當前教育的結構性問題》，台北：遠流。
- 黃武雄（2003）〈教改怎麼辦？〉收於《學校在窗外》，台北：左岸。
- 黃春木（2004）〈戰後臺灣社會升學主義之形成與發展〉《建中學報》，第十卷，頁 197-217。
- 黃毅志（1998）〈教育階層、教育擴充與經濟發展〉《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第 28 卷，頁 25-55。
- 黃毅志（1998）〈教育階層、教育擴充與經濟發展〉《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第 28 卷，頁 25-55。
- 黃毅志、陳宜靖（2005）〈台灣的升學問題：教育社會學理論與研究之檢討〉《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第五卷第一期，頁 77-118，台北：台灣教育社會學學會。
- 張荳雲（2003）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第一波（2001）國中學生問卷、第一波（2001）高中職五專前三年階段學生問卷。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管理、釋出單位】。
- 張荳雲（2005）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第二波（2003）國中學生問卷、第二波（2003）高中職五專前三年階段學生問卷。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管理、釋出單位】。
- 張盈堃（2005）〈文憑病：重思追求更高的教育作為階級向上流動的迷思〉《東吳社會學報》第十八期，頁 1-42。
- 張郁雯、林文瑛（2003）〈升學主義還是升學機會？—升學壓力的社會意涵〉《教育心理學報》第 35 卷 第 2 期，頁 167-182。
- 張清溪（1994）〈教育與人力規劃〉收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主編）《台灣的教育改革》，頁 281-311，台北：前衛。
- 張清溪、吳惠林（1996）〈教育應以經濟發展為目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專案研究報告》。
- 萬毓澤（2005）《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起源與矛盾：批判實在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婉琪（2002）《政治控制、教育管制與升學主義：歷史社會學的詮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Bourdieu, Pierre, 刑克超譯（2002）《再生產：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點》，北京：商務印刷館。

- Collins, Randall 著，劉慧珍,吳志功,朱旭東譯 (1998)《文憑社會：教育與階層化的歷史社會學》，台北：桂冠。
- Dore, Ronald Philip (1976) *The diploma disease :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London : Allen and Unwin
- Monchinski, Tony (2000) *Capitalist Schooling: An Interview with Bertell Ollman*, Cultural Logic, ISSN 1097-3087, Volume 4, Number 1, Fall, 2000.  
<<http://clogic.eserver.org/4-1/monchinski.html>>
- Rikowski, Glenn. (1990) *The Recruitment Process and Labour Power*. Unpublished Paper, Division of Humanities & Modern Languages, Epping Forest College, Loughton, Essex, July.
- Rikowski, Glenn. (1995) *Education Markets and Missing Produ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 7-9<sup>th</sup> July.
- Rikowski, Glenn. (1996b) *Apprenticeship and the Use-value Aspect of Labour Power*. First paper prepared for the ESRC Seminar Series on Apprenticeship, Nene College, Northampton, 31<sup>st</sup> May.
- Rikowski, Glenn. (1996c) *Educati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Learning Society: Towards A Materialist Analysis*. Unpublished paper,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March.
- Rikowski, Glenn.. (1996d) *Revealed Recruitment Criteria Through the Use-value Aspect of Labour Power*. Seco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ESRC Seminar Series on Apprenticeship, Nene College, Northampton, 31<sup>st</sup> May.
- Rikowski, Glenn. (1999) Education, Capital and the Transhuman, in: D. Hill, P. McLaren & G. Rikowski (Eds) *Postmodernism in Educational The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 Resistance* (London: Tufnell Press).
- Rikowski, Glenn. (2000a) *Why Employers Can't Ever Get What They Want. In fact, they can't even get what they ne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chool of PCET, Staff/Student Seminar,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Monday, 27<sup>th</sup> March.
- Shavit, Yossi and Hans-Peter Blossfeld. eds.(1993)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